

◆ 欧阳修贡举革新

宋初文风沿五代余习,刻意雕琢,追求华丽辞藻,讲究骈偶。当时的士子喜欢创作怪怪、奇涩之文,堆砌辞藻,典故,没有核心思想,片面追求文章华丽,表现出文化贵族的倾向。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提倡平易文风,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

庆历三年(1043),在杜衍、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的背景下,欧阳修上《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提出按先策、次论、最后诗赋考试的顺序,依次淘汰。虽然欧阳修等人的提议改革最终淹没于党派之争上,但是朝廷对贡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有所加强。

嘉祐二年正月,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省试,副考官为韩绛、王珪、范镇和梅挚,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这些都是怀揣着改革科举愿望的同道。欧阳修大举改革,一改以往一次考试定输赢的做法,改为四场考试取综合得分,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考核考生的综合实力。在这场考试中,欧阳修为了文体改革,录取了大量文风平易近人的举子。

贡举改革,适应了宋朝当时尊儒重德的社会风气和政治需求,在欧阳修的努力下,科举考场上纪律严明,扫除了作弊的风气,而考官也能秉公改卷。但是这次革新也得罪了一些权贵,当时有很多擅长写“太学体”的名人没有考中,他们落榜后愤而揭榜,聚众闹事,甚至在欧阳修上朝的路上对其围堵谩骂。最为过分的是,有人还写祭文,绑在石头上,扔到欧阳修的院子里诅咒他。

在权力和外部威胁的压迫下,欧阳修没有屈服,继续和同道并肩战斗,为扭转文坛积弊而顶住逆流。宋仁宗很信任欧阳修,他觉得选上来的全都是人才,从此决定,中了省试的举子,朝廷全部录用。

梅尧臣为诗坛宿将,他的诗歌与欧阳修的古文、蔡襄的书法代表了庆历、嘉祐年间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梅尧臣与苏舜钦齐名,时号“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其诗风格“闲肆平淡,涵演深远”,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北宋诗文革新时期,梅尧臣、欧阳修是运动领袖,以革除晚唐五代以来诗风之弊为契机,借儒学复兴之大潮,以复古求新变,对宋代诗风转变影响很大,初步确立了宋诗的面貌。因此有“宋诗开山祖师”之称。

在欧阳修的大力举荐下,性格倔强、仕途坎坷的梅尧臣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充任《唐书》编修官及国子监直讲,后又升任尚书都官员外郎。

◆ 三文豪

苏轼、苏辙、曾巩

这次科举考试有3位后来成为北宋时期的散文大家,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这就是苏轼、苏辙、曾巩。

嘉祐元年年初,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五月到达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因为苏轼兄弟没有参加老家益州的解试,必须通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裁精。”欧阳修的这首《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描写了他主持礼部考试时的情景——贡院考场幽雅寂静,考生们奋笔疾书。看到英才济济,欧阳修由衷地感到高兴,表达了惜才爱才的真挚感情和为朝廷选出栋梁之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388人金榜题名,后来从中涌现出三文豪、二理学、一名将、九宰执,可谓人才云集,被称为“最牛”的一次科考。

过汴京的解试才能获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在由眉州来京的45个考生中,最后获得省试资格的有13人,苏轼、苏辙二兄弟名列其中。

苏家兄弟忙着备考,苏洵却穿梭于社交活动,积极结交社会知名人士。苏洵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呈上自己的著作。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的文章。苏洵虽然没有中进士,却因此为这一次考试扬名天下,也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氏兄弟二人都以优等高中进士,成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与父亲一起并称为“三苏”。

曾巩,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幼年能文,语已惊人,未冠而名闻天下。曾巩18岁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入大学后,曾巩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对曾巩的才华欣赏有加,悉心指导和提携,有师生之谊。曾巩还与杜衍、范仲淹等人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之前屡试不第。

这次科举考试,欧阳修还闹出一段“乌龙”佳话。考试的文章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写得简短精练,全文600余字。他以忠厚立论,紧扣主题,从赏善惩恶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赏与罚的范畴和方式上,苏轼剖析得细致入微、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全篇文章说理透彻严谨,结构紧密完整。

梅尧臣在阅读此卷时,被其清新洒脱的文风、酣畅淋漓的论辩所吸引,认为有“孟轲之风”,评了满分后推荐给欧阳修,说此文可评第一。欧阳修看后,不禁击掌赞叹,认为梅尧臣的评判是恰当的,同意其意见。可是作为主考官

汪曾祺:去得最多的图书馆

1939年夏天,汪曾祺来到云南昆明,寄住在青莲街同济中学的宿舍里。他以第一志愿考取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在学校发了榜还没有开学的日子里,他除了骑马、坐船游玩之外,几乎每天都去昆明的翠湖图书馆看书。图书馆不大,形制有点像道观,非常安静整洁。有一个侧院,院里种了好多盆白茶花,安静而欣然地开着。

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也从不言语。他来了,开了门,把壁上不走的挂钟时针“喀啦啦”一拨,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图书馆的藏书在楼上,楼板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这书单按当时昆明人的叫法叫作“飞子”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啾啾啾”,木盘就沿着滑车吊上去了。不一会儿,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就装着借书人借的书下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方法汪曾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不少,而且有些善本能满足汪曾祺的需要。过了两三个小时,那位干练而沉默的图书馆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时针又“喀啦啦”一拨,拨到12点:下班。读者们似乎对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他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在此看书是没有目的的,逮着什么看什么,到这里来主要是享受特有的那份悠闲和恬静。翠湖图书馆是汪曾祺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图书馆,那个性独特的图书馆管理员,独特的图书借阅方式,让他久久难以忘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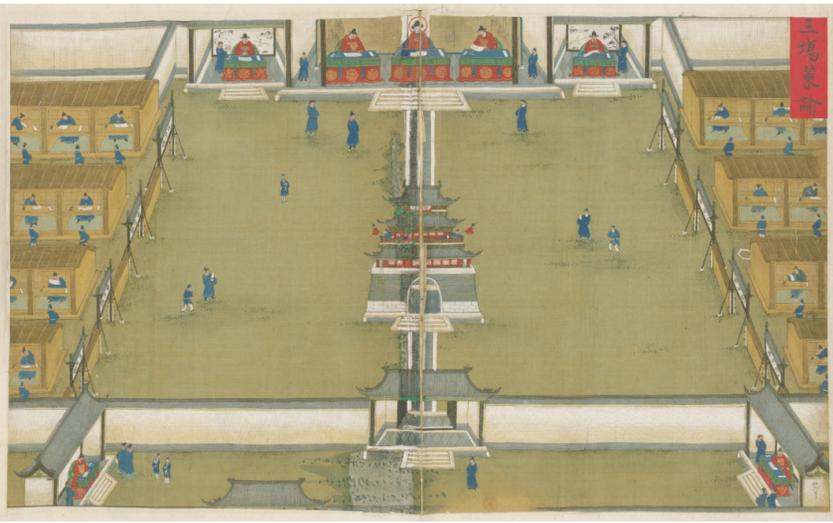
察必:勤俭有节 变废为宝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在我国古代也有不少环保达人,忽必烈的皇后察必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皇后出自弘吉剌部,是地地道道蒙古大草原哺育的姑娘。她最大的美德便是继承了草原人勤劳朴实的优点,勤俭为本,非常懂得过日子。在后宫,她亲自率领宫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废物回收利用”环保活动,

嘉祐二年 群星璀璨

贾传静



《明人考试图横轴》,故宫博物院藏

的欧阳修心想世上能写出此文者非曾巩莫属,选自己的弟子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改评为第二。欧阳修气节高雅、严于律己之风可窥一斑。

可是当拿来原卷,拆开弥封对照后,欧阳修却大吃一惊,此文竟不是曾巩所作,而是苏轼所写。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大为称赞,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其惜才、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 二理学家

程颢、张载

程颢,河南洛阳人,嘉祐二年中进士后,历任鄆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等职。

宋神宗年间,程颢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他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

程颢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且强调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其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载也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陕西眉县人,生于官僚家庭,少年时就喜欢读书。除了儒家经典,还阅读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书

大力提倡“节约型”皇宫生活。她让宫女收集用旧用坏的弓弦,继而煮制,织成绸帛,然后做成衣服,竟然非常坚韧结实。察必皇后亲自煮弓弦、自织丝帛的壮举,被朝臣传为佳话。

还有一次,察必皇后来到专为皇宫造酒的宣徽院,竟在库房里发现许多废弃的羊膻皮,被搁置了好多年。察必命人搬到后宫,与宫人们将其洗晒干净,裁剪妥当,然后细细缝合,做成地毯再次利用起来。

解惑: 清代士子请客吃饭为何叫“吃梦”

清同治十年(1871),王闿运(晚清经学家、文学家)进京会试。他的朋友多,朋友的朋友更多。因此,在办正事之余参加的吃请也很多。据《湘绮楼日记》记载,在此期间,几乎宴饮无虚日。

这年6月27日,许振祚发帖请王闿运赴宴,与宴者共计8人,其中,以王闿运等3人为“梦神”,以许振祚、谭绍洵等5人为“展梦”。这次宴会就叫“吃梦”。吃饭就吃饭,为什么叫“吃梦”?不管吃什么都要买单,依常理,许氏招客,自应由他买单。“梦神”二字,或可猜测为贵宾,即王闿运等3人无需掏钱;而许氏与其他4人具有“展梦”的资格,那么,饭费难道是由“展梦”者分摊不成?

后来,读到吴仰贤《小庵庵诗话》,才算解开这个谜团。其书云,参加会试的士子们,在发榜之前,每有聚餐,与会者都不用带钱包,带上嘴就行(“不携杖头钱”),胡吃海喝完毕,拍屁股走人。买单的事谁负责?待到发榜,由中了举人、进士的与宴者负责。因为在吃的过程中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吃”谁的请,而大家都“梦”想这能由自己买单,所以,这就叫“吃梦”。

由于当时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不够完善,不免有了上榜却逃单的人,于是,大家在与宴者中挑出一两个不参加本科考试的,让他们作“酒监”,此即所谓“梦神”。一般情况下,“梦神”不用买单,故“成乐为之”。只是,倘若手气不好,坐到一桌名落孙山的席上,则出钱人人有份,“虽梦神不得免焉”。故又有诗云:“莫美监筮作梦神,梦神也是梦中身”。

籍。嘉祐二年中进士后,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职。

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在其弟张戡上书批评王安石而被贬官之后,张戡辞职归乡。随后,他创建了横渠书院,边授徒边著书,渐渐创立了代表自己思想体系的“关学”学派。

张载认为生在上世,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关于其讲学的主旨,集中地体现在“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上,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关中兴学,使“关学”大盛,学者辈出。他以德育人,关中风为之一变。

程颢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共同构成了宋代理学的主流。

◆ 一名将

王韶

王韶,江西德安人,嘉祐二年及第后初任新安县簿,继为建昌军司理参军。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上《平戎策》三篇,正确分析了熙宁地区各方势力的状况,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的方略,与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得到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和采纳,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军事。王韶从此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出掌边疆军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

王韶足智多谋,富于韬略,在开拓熙河的过

戴敦元 清介自持养廉德

王厚明

清朝一代廉吏戴敦元,史称他清廉寡欲,不拘小节,“数十载一布被”,始终清正廉明、节俭朴实,为人称道。

戴敦元学识渊博,作风务实,善于躬身实践,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嘉庆二十四年(1819),戴敦元赴广东任高廉兵备道。这是戴敦元第一次出京外任,他担心自己不了解当地实情而影响施政,特意选择先去粤商云集的苏州南濠,借此机会了解广东的风土人情和施政利弊。他以客商的身份与粤商同寓,获取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为接下来在广东开展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在任时间不长,但戴敦元秉持“报国无才勤补拙,安民有愿尽除冤”的宗旨,做了许多深得民心之事,被当地百姓称为“神公”。

戴敦元后来改任山西布政使,他前往赴任时不事声张、不搞排场,不解衣,不下车,每天五更就催车夫上路,饮食不过是六枚麦饼,且全在车上解决,从不劳烦沿途州县,以致戴敦元“独行数千里,而舆夫宿知其为新任藩使者”。当时官场上有一个陋习,凡是上官过境,沿途州县都要劳师动众迎迓送往,不仅大摆筵席,临走前还要给上官准备礼品。戴敦元不为官场恶俗和潜规则所困,更不为钱财折腰,他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坚决将这些陋习革除,大大净化了官场风气。

道光十二年(1832),戴敦元任刑部尚书。在京任职期间,他每天办完公事就回家,谢绝宾客,“同僚非公事不得见”,拒绝私下上门拉关系。居京师十年,戴敦元专治刑狱,所治狱无纵无滥。清代达官显宦盛行八抬大轿,而他作一部尚书,着粗衣,坐敞车,生活俭朴,上下班经常步行,在衣食住行诸方面崇尚节俭,律己甚严。

有一年冬天,天降大雪,戴敦元身披雨罩,手抱文书,步行到街上,叫了一辆脚夫去上班。到了刑部衙门,“吏役呵殿而入”,戴敦元脱去雨罩露出官帽上的珊瑚顶戴。在清

程中,他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凿空开边”的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王韶“用兵有机略”“每战必捷”。熙河之役,拓边两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并生擒青海东部吐蕃首领木征,将其送往京师。

熙河之役的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极大的鼓舞,使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达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可以说,熙河之役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所取得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军事胜利。

王韶因战功赫赫一路升迁,累进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等职,他本人也以“奇计、奇捷、奇赏”著称,被时人称为“三奇副使”。

◆ 九宰执

林希、章惇、吕惠卿等

嘉祐二年的进士榜上,后来有9人官至宰执位置,即林希、章惇、吕惠卿、曾布、张璪、梁燾、郑雍、蒋之奇、苏辙。

福建人林希,在省试中已名列第一,有望在殿试中夺魁,但是其文章《民监赋》开头第一句便有“天监不远,民心可知”一句,宋仁宗认为是在批评自己,很不高兴。而他看到章衡的文章破题写道:“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心里就十分受用,但嘴上却谦虚道:“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当即钦点章衡为状元。

林希尽管得失状元,但走入仕途后得到章惇的赏识,举荐他为中书舍人,参与修撰《神宗实录》。后又迁礼部、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宰相。后来,由于被曾布陷害,致其背叛章惇,林希因此获罪,被罢到亳州、杭州任知府。在杭州任上因题“苏公堤”三字,苏堤由此得名而流传千古。

上面提到的章惇为章衡族叔,才智出众,学问广博精深,善写文章,且性格豪爽、真挚,相貌俊美,举止文雅洒脱。嘉祐二年,章惇进士及第,但他耻于在其族侄章衡之下,拒不受教,扔掉诏敕回家。嘉祐四年,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

章惇最高官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作为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章惇一生致力恢复熙宁新法,修正弊端,使新法得以完善发展,是熙宁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还主持重修《神宗实录》;其经略湖北、湖南时,发展当地经济,协调朝廷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后征战西夏,为宋廷的开疆扩土作出了贡献。

吕惠卿中进士后,因与王安石政治理念相合而得到器重,并深得宋神宗的信任,成为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后,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为继续推动变法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大半生都被卷入新旧党争中,宦途起伏不定,后半生一直在朝外辗转。

曾巩的弟弟曾布,苏轼的弟弟苏辙,文名均比哥哥略逊一筹,但后来的官职都位列宰执。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人才喷涌,群星璀璨,有24人在《宋史》中列传,在文学、政治、经济、经学领域都有领军人物,对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影响巨大,也因此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拾遗

刘伯承:不称自己是军事家

20世纪50年代初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在“刘伯承”条目下这样写道:“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的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吧“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许多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蔡智堪:智取情报

蔡智堪1888年生于中国台湾苗栗县,11岁时随父旅居日本,早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蔡智堪开设洋行,1905年加入同盟会。此后,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广泛结交日本政界高层人士。张学良的外事秘书王家桢与其相识后,便嘱其搜集日本高层情报。

一日,蔡智堪收到王家桢的密信,其中写道:“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蔡智堪觉得,采用金钱收买最高机密这种办法难以奏效,不如利用日本政客间的矛盾,智取奏折。蔡智堪打探到,《田中奏折》出笼后,遭到日本保皇派和民政党的抵制。于是,蔡智堪秘密会晤了民政党顾问牧野伸显。正巧,牧野伸显的妻弟山下勇在日本皇室内担任书库管理员,有机会接触到高层公文。

1928年7月19日,蔡智堪随身携带着牧野伸显赠送的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证(第72号)”,在山下勇的带领下,以日本皇官图书修裱师的名义于凌晨潜入皇家书库。经过一番查找,蔡智堪在天皇神龛里找到了一份密封文件,打开一看,“田中奏折”四字映入眼帘。在连续两个夜晚的描摹后,蔡智堪终于顺利获得了《田中奏折》的全部内容。